

日据时期台湾电影的社会教育

——以《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为例

林 豪*

日据时期台湾电影史的学术性研究始于1990年代。按照内容、性质、用途来分，日据时期的台湾电影分为娱乐性质电影、宣传性质电影和教育性质电影。娱乐性质的电影通常是具有故事情节的剧情片；宣传性质的电影是官方为某个事业做的团体宣传片；而教育性质电影是总督府为社会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之用的官方性质的，以殖民主体自身的需求为主要目的影片。在1930年代以前，官方在台湾各地主要通过巡回放映的方式，向一般民众普及日语、进行政策宣传、宣扬总督府殖民实绩。在1930年代以后，中日战争的时期到来，总督府的各项社会教育任务转化成通过积极运用电影作为国策宣传的手段和战争动员的媒介。

电影传入台湾初期，主要被作为观赏性质的娱乐产品、商业性质的表演活动与慈善募款的工具。从电影传入初期《台湾日日新报》中对电影放映活动的报导可知，记者大多强调电影的电气化性质及其作为崭新科学技术的一面。⁽¹⁾总督府开始利用电影作为彰显殖民统治现代化和文明的手段。

1914年开始，台湾教育会开始运用电影作为社会教化的媒介。1923年出版的电影理论专书《社会教化与活动写真》中便指出，电影生活的画面、自由的题材及千变万化的场景变换等特质，能够在视觉上有效地引起观看者的注意和兴趣，且具有牵动情绪与形成群众心理的感染力，是社会教化宣传的理想工具。⁽²⁾台湾教育会职员中村贯之指出，1931年，台湾运用电影从事社会教化的情形已颇为发达，全年度放映次数达2200回，观看人次约150万之众。⁽³⁾

* 作者简介：林豪（1988-），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戏剧影视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1) 《电气活动大写真》，《台湾日日新报》，1900年6月21日日刊6版。

(2) 山根幹人：《社会教化と活动写真》，东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第50-55页。

(3) 中村贯之：《臺灣に於ける教育映画》，台湾教育第360号，1932年7月，第47页。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统治当局更积极地通过各种官方手段放映电影，还采取了经费补贴的方式，鼓励营利性质的影院放映各类新闻影片，并且还利用各种官方规定的主题号召民众观看新闻性质电影。

1937年11月的《台湾时报》中刊载《情报与宣传》一文，强调报纸、广播及电影等媒体在主导国内舆论取向与国家政策宣传方面之重要性，并特别注重电影的价值，认为新闻电影“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宣传手段之一”。⁽⁴⁾而同期刊登的另一篇专文《时局与新闻电影》，更明确地指出新闻电影在台湾运动之价值，文中认为“即使是在尚未普及日语常用的农村地区，电影亦能透过影像的视觉传递，注入对民众思想之影响力”。⁽⁵⁾

由上可知，电影传入台湾之初，就被日本总督府官方所运用，在1914年后正式成为官方社会教育的工具。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电影成为战争动员的媒介。本文以战争动员期日本总督府拍摄的纪录片《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为例，分析殖民当局是如何利用电影来进行社会教育，以及在帝国的主导下电影活动对时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的影像再现

被殖民者唯有了解过去的历史，才能重新建构以自己为主体的历史。“历史的影像再现”，简而言之就是“图像历史”或“影视美学”。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怀特1988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中首创了“影视史学”一词，指出电影所传达出老的影像与记录，其实也是历史书写与表达当中的一种呈现。

然而，历史是一“竞争场域”，各种力量在此竞争争夺历史诠释权，过往的历史版本总是由权力中心或是第一世界国家所主导，历史记载了战争、灾难、大事件、英雄故事，均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地方性、区域性、弱势族群、女性均上不了台面，他们的故事也从不被听见，这样的英雄史观李欧塔称之为“大叙述”。相对于“大叙述”的说法，女性主义学者哈若薇则强调一种“设身处地的知识”，也就是在谦虚的见证过程中，了解自己的观

(4) 大塚正：《情報と宣傳に就て》，《台湾时报》，1937年11月，第66-73页。

(5) 原保夫：《時局とニュース映画》，《台湾时报》，1937年11月，第74-80页。

点始终只是破碎的，借由这样的认知解放，来拆解知识与权力的迷思。⁽⁶⁾在殖民时代的历史记忆中，影像纪录由历史的偶然发展成了后殖民时代中解释历史的必然。

台湾文建会补助经费进行的《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据时期纪录影片成果》出版了影音和专刊。影音光碟收录四部馆藏日据时期台湾记录影片——《国民道场》、《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幸福的农民》、《南进台湾》。每一部影片都是历史的再现，《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记载了30、40年代台湾的被殖民景象。《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是一部黑白纪录片：规格为35mm，925尺，影片全长10分25秒，日文发音，是1941年台湾总督府文教局在台湾教育会写真部协助和朝日映画制作株式会社共同制作的，历时4个月完成。“2002年在台湾嘉义出土了一批由台湾总督府拍摄的新闻与记录影片，总共有168卷之多，另有准演执照137件，放映机具器材等33件。”⁽⁷⁾《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便是其中的一卷。邱坤良说：日据时期老电影的重生，影像文化资产获得保存，为台湾早期电影史增添宝贵的画面，而透过播映，让观众了解数十年前台湾的地理景观与人文风貌，有助于拓展国人的历史视野，具有深刻的文化意涵。⁽⁸⁾

《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记录位于台中的“勤行报国青年训练场”，现今考据此地点应位于台中县雾峰乡。台湾总督府于1940年借用台北帝国大学山地农场。影片中出现许多着军装的青年男子被召集至训练所，并过着类似军人般的生活，从早晨升旗、做早操、体能训练、上课、造桥、铺路、除草、挖土、农作事务等过程，利用集体生活赋予台湾当时的青年学子建设国家、效忠日本天皇的神圣使命。此部影片虽然只有短短的10分25秒，但在殖民时代中扮演着官方创造历史的角色，所以，它也成了历史的记录者。影片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主题：皇民化精神指导、学科学习、军事操练、劳动作业。影片开始的画面呈现青年队员在长官指挥下列队走出训练所的影像，旁白提示总督府设立“勤行报国青年队”的原因和目的：台湾纳入帝国版图，

(6) 井迎瑞：《(2006)片格转动间之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委托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代电影资料整理及数位化计划”成果发表会手册。第41页。台南市：台湾历史博物馆。

(7) 井迎瑞：《(2006)片格转动间之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委托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代电影资料整理及数位化计划”成果发表会手册。第40页。台南市：台湾历史博物馆。

(8) 井迎瑞：《(2006)片格转动间之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委托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代电影资料整理及数位化计划”成果发表会手册。第40页。台南市：台湾历史博物馆。

受天皇恩泽，至今已45年，过去几乎不受重视的南海孤岛台湾，如今身处这光辉的时代里，要踏出建设新台湾的第一步，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青年，其教育训练必须有划时代的变化，故总督府设立“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训练所”。由台湾勤行青年队设置的目标可知，要踏出建设新台湾的第一步，必须先从台湾青年的教育训练着手，经由不同于过去的教育方式，养成具备皇国民体质的台湾青年。若进一步从台湾在帝国中的位置来看，“建设新台湾”还具有建设台湾成为“帝国南进基地”之目的，台湾青年则被赋予“担负帝国南方开发据点的未来”之任务。⁽⁹⁾

1937年台湾总督府开始推行“勤行报国运动”，各州厅陆续成立勤劳奉仕队，动员地方民众组成学校队、青年队、成人队及一般队（由其他社会团体，如银行、会社等组成），进行5日以上的短期劳动服务，主要作业内容有兴建交通、卫生、防灾等公共设施，生产军用农业物资，以及按照特殊需求决定的作业项目。⁽¹⁰⁾借由这些运动，一方面台湾总督府可以整备公共设施；另一方面，让青年在训练的过程中养成奉公报国的观念。在劳动的过程中，训练主导官非常重视团体的生活和共同的劳动，电影画面中的青年全身心投入身心之锻炼。特别针对青年队、学生队进行合宿，并且参照行军人员的生活模式进行集体管理的训练。而此类型的活动过程中，社会教育的手段得到了全面的贯彻。

1939年，总督府设置“勤劳奉仕调查委员会”，针对劳动作业制度化的立案进行调查审议，原先计划将实施范围从青年团扩展至一般台湾人，以20-25岁总数约30万的青年层为主，设置专门训练所，作为动员训练青年的机构。调查委员会一方面鉴于直接制度化实施仍有许多难处，二方面各州厅先前针对青年实施的短期劳动服务训练，虽具一定成果，但又时间过短与指导者不足等问题，因此计划再劳动作业全面制度化以前设置一个过渡性质的机构，以总督府文教局社会课为中心，由各州厅选拔优秀青年组成劳动报国团体。⁽¹¹⁾但到了隔年3月28日“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正式成立时，其设置目标已不只是作为劳动作业制度化的过度阶段。这一青年队的设立是台湾总

(9) 临时情报部：《国家总动员と本岛青年》，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2：8），第287页。

(10) 台北州教育课：《勤行报国运动に就て》，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3：6），第201至207页。

(11) 《本岛青年を总动员 皇民化运动の彻底へ 报国训练所を制度化》，《台湾日日新报》，1939年5月23日。

督府加速皇民化进程的又一突出的举措。训练着重劳动作业和体能操练外，也强调皇国意识的灌输，从青年队的日课表中可知，每日清晨举行升旗、皇宫遥拜、神宫遥拜及“神前行事”，透过仪式性的活动增强青年对于皇国的认同，并于上午劳动作业前进行“精神训话”指导，实际内容系修身科与皇民科的学习。⁽¹²⁾

1940至1942年间，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完成6221名台湾青年的训练编入在乡青年队，1940年高雄训练所撤去后，台中、台北、花莲港各所每次训练的人数大约维持在300人左右。青年队能够定期动员300人左右的青年从事劳动服务，每年大约可提供2700名人力资源，可见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组织亦具有战争人力动员的性质。

《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影片中的旁白提到：“随着节奏声起飘扬的国旗，向遥远皇宫致敬，这群青年的心，深深感受到身为日本人的感激与骄傲。为了巩固神所恩赐的皇国基础，站在勤行报国第一线的同志，身洁心静。敬慎地在大神面前祈祷，祈求本岛六百万同胞，有着纯洁的心及热情，互相扶持、和睦相处、没有人怨恨争执，也没有人偷懒，激发亲和协力的报国风气。”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对殖民者精神教育的指导可谓无孔不入。我们必须将“符号的出现时刻”或“主体问题”或“社会现实的话语建构”重新历史化。⁽¹³⁾殖民主义的历史是在帝国主义指导下的历史，是为殖民主体建构的非客观、非理性且带有霸权式控制的历史。帝国主义的历史叙述带有明显的侵略性、同化性，且赤裸裸的表现为妄自尊大与种族迫害。霍米巴巴在《纪念法农：自我，心理和殖民条件》中说：对他者的否定总是会恶化认同的“边缘”，揭示出身份和侵犯同时共存的那个危险的地方。因为否认总是一个反作用的过程；是对已经留下创伤标记的那个他性的一半认可。日本殖民主义在训练台湾青年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矛盾的情感，这种矛盾的情感迫使殖民主义者用更加激进的方式来训导人民，包括胁迫性需要被殖民地人民向那个危险的身份认同屈服，并且帝国主义式对理想秩序的虚伪性也表露无遗。正如霍米巴巴在《献身理论》中说：文化永远不是自在统一之物，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简单二元关系。正是语言过程中的这种差异成为意义生成中的关键并确保意义永远不是简单的模仿，永远不是简单透亮的东西。日本殖民统治者在

(12) 台湾总督府：《台湾事情 昭和十五年版》，台北：台湾总督府，1940年第241至242页。

(13)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4页。

影片中要求台湾人民唱日本国歌，向日本皇宫致敬，这种要求“自在统一”的举动，代表的不仅仅是顺从和压迫的关系，也不仅是新的权力机制的表现，它仅仅记录的是当下的某一时刻，对于失去主体权的人民受帝国主义的殖民行径的驱使而做出的异常举动，或者说是无可奈何的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历史影像记录。

二、帝国主义主导下电影的社会教育

据赛义德说，东方主义话语自十八世纪晚期以来几无变化，一味展示着哑口无言的东方形象。东方人和西方人直接实际的人的交往被有系统地压抑了。“东方主义舞台”上听不到东方人的声音。福柯感兴趣的是一种特定文化秩序通过话语定义构成自身的方式：清醒与疯癫，健康与病痛，守法与犯罪，正常与乖戾。在福柯看来，种种违法现象的存在并非法外自由的领域，而是文化所产生和安排的经验。所以按照赛义德的分析，“东方”只为西方而存在。《东方主义》的任务就是拆解这种话语，暴露它的压迫系统，清理它的旧观念和一成不变的形象“档案”。⁽¹⁴⁾影片放映时，有两种时间在交汇，一种是属于胶片的时间，一种是属于殖民主义的时间。胶片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论保存技术多么先进，胶片终将坏去，但是殖民主义的时间却像是历史的长河，源源不断地从以前走过来，经过我们面前，又走向了未来，但与我们交汇时，却烙印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以各种形式再现在国民思想、性格、生活与文化之中。⁽¹⁵⁾胶片记载了历史，我们通过胶片重现并且还原自己的历史记忆。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不受控于殖民主义的历史，而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影像来了解历史，就是要“激活历史记忆和历史主体性，恢复其中的非连续性能量，抛弃公共机构力量创造的有连续性的官方或意识形态的故事，讲述那以外的故事。”⁽¹⁶⁾对于台湾，就是要跳出在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历史叙述，建构属于以台湾自身为主体的历史记忆和叙事。

(14)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1页。

(15) 井迎瑞：《(2006)片格转动间之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委托台南艺术大学执行“馆藏日据时代电影资料整理及数字化计划”成果发表会手册。第48页。台南市：台湾历史博物馆。

(16)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69页。

“为了重新打开帝国主义的知识断裂，同时又不至引起对失落的本原的伤怀，批评家必须转向帝国主义统治的档案。”⁽¹⁷⁾日据时期的台湾，“影片所具有的记录和表述功能，首先被殖民统治者所利用。1920年前后，台湾总督府便利用在山地放映‘活动写真’的方式，向台湾原住民展现‘神奇的科技’与外面世界（尤其是日本）的强盛与进步。显然，总督府就是要利用影片所具有的强大震慑效果和眼见为真的说服力。这样的脉络，还有内容广泛的各种‘教育影片’。这些‘教育影片’，包括推广农业技术的影片，指导生活规范的社会教育影片、强调政治统治政绩及推动新政策的宣传片，甚至还有1930-40年代大量出现以号召战时增产、动员人心、强化战时意志为目的的宣传片。另一个脉络，则是利用影片所具有的纪录功能，以影片记录台湾的人文、景物和各种殖民者的仪典性活动。”⁽¹⁸⁾《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台湾历史博物馆修复馆藏日据时期纪录影片成果》是由殖民者所定调的，是在帝国主导下的电影。

日本的青年训练理念，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青年教育趋势影响，强调青年担负着国家下个世代发展的重任，因此青年的育成将攸关国家未来之兴衰。时论提到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青年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地发展，其中，尤以德国、意大利的青年教育成效最为卓越，认为应加以效法。⁽¹⁹⁾帝国主义国家集体奉行着涵养青年“减私奉公”、“勤劳报国”即报效帝国主义的使命。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的施政方针随着殖民宗主国的政策和形势不断调整，对台湾民众的社会教育从同化转到了皇民化。1931、1932年台湾各地陆续仿照日本国内成立部落振兴组织，其功能主要是推动社会教育措施的末端组织，迨至1937年前后，部落振兴会逐渐成为台湾总督府贯彻国策的基础单位。⁽²⁰⁾台湾总督府比照日本国内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配合贯彻，动员州下的成员进行指导训练，成立了“台湾教化团体联合会”，展开了“部落振兴运动”。在经济上实行“产业振兴”，在精神上施行“敬神尊皇与普及国语”，在生活上则加强“公民训练和生活改善”。

(17)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79页。

(18) 吴密察：《片格转动间的台湾显影》，《序言》。台南：台湾历史博物馆，2008年6月，第4页。

(19) 陈清波：《魁挺身队的使命》，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10：9），第342页。

(20) 何义麟：《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据时代末期日本对台湾的教育政策与教化运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第161、164、173页。

可知此次皇民时期的运动，日本殖民当局试图将台湾民众的经济、精神、生活教育变成一个在总督府统制之下的教化组织，形成在帝国主导下的社会教育。随着中日局势的愈发紧张，日本国内发出了“彻底同化”的社会教育命令。“彻底同化”的具体措施有二：一是经济、立法层面的同化，经济上加强资源开发与产业振兴以谋求民生安定，立法上则本于“内地延长主义”方针，致力落实“内台一元化”目标；二为精神层面的同化，依“社会教化指导要纲”为原则，配合学校、警察、部落振兴会、街庄协议会、农事实行组合及青年团等机关、团体，推行以下措施：1、广设神社作为地方教化的中心；2、普及民众奉拜神宫大麻；3、设置国语讲习所，奖励民众常用日语；4、加强青年训练同时普及实业补习教育设施。⁽²¹⁾另外，该运动推动的事项亦兼及“革除封弊”、“农事改良”及“改善卫生”等近代化措施。从“民风作兴运动”的内容来看，已经具备部分皇民化运动的性质，与日后的战争动员具有连贯性。⁽²²⁾在1937年8至11月间，在台北州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实施情况下，各地举行巡回电影放映会，播放中日战争新闻片，计115场，累计放映962卷影片，139000人次观赏。⁽²³⁾

《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影像中关于军事操练的部分也深刻地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社会教育的军国主义特性。影像记录青年队员列队、行进、整队，以及持铁锹上下肩的军事操练过程，旁白提到：他们同时以刺枪及铁锹进行锻炼。三个月的训练时间，让他们从基本训练进展到部队军事训练。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的肩枪训练皆以铁锹代替，1941年制作影片时，台湾还未正式实施志愿兵制，但之前总督府已依军属、军夫名义招募台湾人至前线从事战场后援，例如1938、1939年两次台湾农业义勇团的派遣，前往中国战场担任军用农夫的角色。⁽²⁴⁾于战线后方种植蔬菜以供应日本军队的需求，当时的相关报导称之为“锹之勇士”。⁽²⁵⁾制度化的军事训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军事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锹之勇士”来激励青年队一来可以模糊勤行报国青年与军人的区别；二来可以激励青年更加全身心投入军事训练和激发

(21) 何义麟：《台湾の民风作兴运动》，《台湾时报》，1937年1月。

(22) 蔡锦堂：《皇民化运动前台湾社会教育运动的展开1931-1937》，第380页。

(23) 台湾总督府：《台湾总督府事务成绩提要 第45编（1939）》，台北：台湾总督府，1942年，第326、327页。

(24) 何义麟：《台湾の民风作兴运动》，《台湾时报》，1937年1月。

(25) 殖民局农业课：《台湾农业义勇团的近况》，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10：9），第340页。

效仿榜样的斗志。在影片最后，青年队劳动作业的景象，则是帝国主义运用殖民地中的劳动力进行殖民服务的场景，青年队开凿中部横贯铁路。旁白中提到：无论是产业、交通、卫生，所有的国营事业他们皆发挥充分奉献的精神。他们穿凿峻岭、填埋深谷，流着令人尊敬的汗水。

三、结语

对他者的否定总是会恶化认同的“边缘”，揭示出身份和侵犯同时共存的那个危险的地方。因为否认总是一个反作用的过程，是对已经留下创伤标记的那个他性的一半认可。⁽²⁶⁾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的社会教育除了达到殖民者本身的目的之外，也产生了对殖民地人民身份认同的反作用。殖民的历史经验被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共同记载。在殖民主义时代，殖民历史是由殖民者书写的，殖民经验的论述亦由殖民者表述。但是时代发展至后殖民时期，殖民主义的历史便有了机会让被殖民者解释和书写，被殖民的历史记忆和经验才重新得到了新的阐述。

帝国主义用虚伪的语言为自己建构历史。电影画面配合旁白的说明，向观者说明他们建造的一切，包括叙述手段、语言、画面的传达和精神的渗透。《台湾勤行报国青年队》揭露了帝国主义在殖民统治时期为自己建构并且美化历史的手段。斯皮瓦克说：我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持批判态度。我试图检验殖民权力的异质性，揭露那种对立的两极在构成被包围的帝国主义批判的学科领域之时的共谋。因此，对于台湾电影，去殖民化的过程就是借助影像记录的历史不断重现发现、建构以台湾为主体的日据时期的历史的过程。

(26)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16页。